

8-1999

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開展

Chiyan ZH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rpeocwp>

Recommended Citation

鄭赤琰 (1999)。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開展 (族群研究論叢1)。檢自香港嶺南大學: <http://commons.ln.edu.hk/rpeocwp/1/>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Research Programme on Ethnicity and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es 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族群研究論叢 Research Program on Ethnicity and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嶺南大學 

屯門·香港

族群研究論叢 1

一九九九年八月

嶺南大學首先獲得香港崇正總會慷慨撥捐經費，於1998年開設了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計劃。作為一嚴肅的學術題目，族群和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領域，亦為中國研究提供了一新的方向和路徑。本計劃的主要目標為拓展華人研究範圍，以及提高世界各地對種族認識及華人商業研究的興趣。

『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開展』

鄭赤琰

撮要

族群的社會結合形式是最古老的結合形式，也是最穩固的結合形式，儘管一個族群可以與另一族群互相溝通的結果可以整合而成為第三種社會形式的結合，但是這三種社會結合依然是新的品種而成為其獨立存在，有其社會特性，甚至文化特徵也然。本論文的主旨是以香港崇正總會對客家學研究的開展作為族群研究個案去探討族群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並從中觀察其科學發展所具備的條件。崇正總會在推動其本族之客家學研究工作，因此可供我們學術界一個很好的研究個案。

I 緒言

本論文的主旨是以香港崇正總會對客家學研究的開展作為族群研究個案去探討族群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並從中觀察其科學發展所具備的條件。崇正總會在推動其本族之客家學研究工作 77 年，不少很具科學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可供我們學術界一個很好的研究個案。

II 客家學應如何定位

客家人的行為有何值得研究的地方？為什麼要研究客家族群？族群研究可以提供什麼學術研究的價值？要解答這些問題，以本文的研究宗旨來說，可以說相當簡單。人的社會結合，到目前為止，不管世界的交通多發達，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有著多麼頻繁，多麼密切，多麼迅速的交往，但依然不出以族群內社會結合形式為其基本的形式，儘管所謂現代化，全球化的發展已成為世界的潮流，但是族群的社會結合形式既是最古老的結合形式，也是最穩固的結合形式，儘管一個族群可以與另一個族群互相溝通的結果可以整合而成為第三種社會形式的結合，但是這第三種社會結合依然是新的品種而成為其獨立存在，有其社會特性，甚至文化特徵也然。正如拉丁美洲之 75% 以上的人種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後裔和非洲黑人的後裔通婚所產生出來的。這些南美人之成為一個新的族群在許多文化，政治經濟特徵條件下而與其原來的母體社會截然不同。他們有其自己的認同，另一個例子也普遍存在於中國，客家人與潮州人兩個族群混合居住的地方，在廣東省豐順縣與陸豐地區便產生了半山客的另一個社會結合。他們無論在語言或社會認同上都有其自己的社會圈子，泰國人還有自己的會館在美國，號稱是個公民社會，理應沒有族群認同的餘地，事實並非如此，¹ 在公民社會的國家層次的結構下，仍然存在著族群的社會結構，甚至他們這些族群的社會結構還得到法律地位的

尊重與保護。最明顯的例子是黑人這個族群可以在少數族群的法律地位下享受到許多權利，連工作不因其黑人族群而受到歧視也在保障之例，其他少數族群也都一樣受到保障。在中國也如此，在中國的國家層次的結構下也都存在著六十多個族群的社會結構，有些族群因為基於某些特殊的文化或宗教的考慮而受到特殊的法律待遇，例如廣西被列為壯族自治區，西藏的藏族，新疆的回族也都得到同樣的法定地位，在此地位下他們的族群認同不但受到承認還因此可以受到種種法律的保障去維護他們自我族群的認同不受到威脅。

這種族群的社會結構在歷史上曾因為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甚至人種的差異而產生種種不同的問題，例如戰爭，同化，侵略，整合，遷移，都是因為族群與族群之間不可避免的接觸而演生出來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中引起最大的興趣不斷被思考與研究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有的對自己的族群如何能壯大最關心，有的則對消滅同化，感化，教化的問題最有興趣，總之，在人類發展的路程中，大家都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如何應對他族，如何振頓自己的後裔。

在過去的研究中，有人採用文明與否作為族群衝突的觀點去研究，如阿里斯多德便認為野蠻一族會招惹文明一族來消滅自己，² 正如斯巴達所遭遇到的命運，這是占希臘雅典城留給西方文明的信念，也因此為西方各個族群向世界作出他們所謂文明傳播的口實，甚至也因此信念而振振有詞地做出了種種侵犯他們心目中所謂落後與野蠻的族群。西班牙與葡萄牙這個最早殖民地主義者採用了人種與文化的同化政策，法國則採用了文化與政治的同化政策，英國則採用了政治與經濟的同化政策，俄國則採用地緣吞併的政策為主，美國是後來的西方強國，眼見歐洲列強所有做法，要不非常暴力而又沒有實效，要不便是自我招引

禍害，吸取這種教訓的結果，把自己的建國方略奠基在尊重族群自我認同而又尊重他族的法律原則下。

與此族群文明侵略論不同的看法，有黑格爾 (Hegel) 的地緣產生文明族群的觀點，對黑氏來說一個族群之所以能夠在人類發展史上發揮他們光輝的文明創造，主要是因為他們要面對他們的生活環境，克服因難的環境所需要的知識從中便創造了他們的文明。反之，在極惡劣的環境條件下根本無法在人為的條件下去加以克服，因此他們的生活知識創造也就欠奉。³ 雖然黑氏也在探討人類文明的來源與發展，但他的文明觀卻與阿里斯多德的文明觀有別。黑氏的文明觀是人類為了克服環境所給予人的局限，其最大的敵人是天然環境，其累積的經驗通過知識的表達而傳給他人與後人。傳達的作用是幫助他人與後人更具求生與發展的條件。更具求生知識的族群便是最有文明的族群，也因此更有條件感召與影響他族的人。這種知識的傳播不是通過戰爭，黑氏說得很清楚，類似游牧民族的蒙古族群，或是處在惡劣沙漠環境的族群，他們之所以變得非常容易訴諸暴力去侵犯他人，而且往往會搞出欠缺文明的戰爭，而是流於殺人放火的滅族戰爭。這種戰爭不可能有文明傳播的意義，真正的文明社會是良性的知識傳播的接觸，這種接觸即使有可能發生衝突，但絕不是殺人放火的暴力角逐，而是通過知識汰留的角逐。這種角逐最終都是以更大的文明拓展作其結局。黑氏通過世界四大文明地區向周邊地區的擴散來說明其觀點，即中國的長江黃河流域，印度的恆河流域，埃及的尼羅河流域，與歐洲的大平原地域。

到了文藝復興的近代，當科學研究再度在人類發展史上發揚光大之後，達爾文提出了他的人類進化論的觀點。他認為人類或其他動物之所以能夠在殘酷無情的競爭下生存與發展下去，是靠其優勝的遺傳因子。所謂「物競天擇，適者長存」達爾文這個觀點雖

有一定的科學根據，可是一旦被錯誤套用，蠻者大可用這套競爭與淘汰的理論，把弱者趕盡殺絕。這個世界只有蠻者生存的空間，弱者沒有，此種見解曾被利用作侵略戰爭的口實，並且為殺害他族提供所謂科學根據。這種觀點在納粹主義猖獗期間，猶太族群被殺害被當作達爾文主義的實踐。⁴ 可是這種不斷淘汰，不斷地產生更優越的血裔，強中更有強中人，最後邏輯的結論必然是只剩下單一族群的結果必然導致族內近親結合，從而又產生低能的後裔。這個結局顯然不會是人類發展的自然傾向，真正的自然傾向根據全球人類族群長期接觸的歷史印証，較接近黑格爾的觀點。事實上近幾十年來幾經科學家多方求証的發現，族群之間的行為傾向主要是對內盡其本能，選能與賢，賢能者則以自己之長，保護族內弱者之短，對外雖常見衝突，但這種衝突的主流發展不是志在滅絕對方，而是志在擊敗對方，敗的一方事實說明強不過人也只好認輸，認輸的最大意義是向勝的一方學其所長。如此觀點的族群關係被稱為平衡向上發展的模式，糾正了達爾文主義所說的以強汰弱的模式。根據羅倫茲 (K. Lorenz) 的研究發現，達爾文所見到的侵犯行為，是一種禮化 (Ritualization) 的現象，經過了禮化後，侵犯行為往往適可而止，殺傷對方不是侵犯行為的最終目的，其最終目的正如達爾文所指，選出強者，但達爾文所錯的，更正確地說是解讀達爾文主義的人所犯錯的是：強者不是受命去淘汰弱者，而是受命去保護弱者。⁵

除了上述用文明與科學的角度去看待族群關係如何演化的問題外，還有一很重要的研究角度，也對這問題作出重大的學術貢獻，那便是採用經濟的角度去看族群的社會結構的情況。用經濟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時，最著名的學者要推崇韋伯 (Max Weber) 了。他把資本主義興起的大貢獻歸功於英、荷兩地在宗教革新後相信新教的基督教徒 (Protestants)。雖然韋伯對這新教徒，所用的切入的角度，不強調其血緣的特

點，而是以宗教的角度切入，認為基於新的宗教價值觀令到這個居住在英、荷兩地的新教徒一族不但精於經商，更能累積資本，令到其經濟力量不斷增長，最終創造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⁶ 韋伯同時還進行對中國，印度與埃及三大文明古國進行研究，並因此指出三國不具備類似新教徒的宗教價值觀，所以資本主義不能產生在三地，他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的產生之所以發生在新教徒身上是基於他們持有的特質。

韋伯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與政界影響甚深遠，長期以來居於這個觀點而把其他世界各地的經濟落後的現象，歸咎於這些族群內在文化或宗教的價值觀，使他們沒法像新教一族那樣的精神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這個觀點在西方盛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的同時，變成了經濟上的達爾文主義，以某個族群為主導統治勢力的國家紛紛成立，國與國之間作出了市場淘汰的情況，一如政治上的政權淘汰，儘管阿當·史密斯的經濟理論說的是以個人為單位的經濟運作，只有個人的勞動力從封建農奴身份解放出來，才能叫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以換取他的生活用品，這樣才能成為獨立的勞工，同時也是獨立的消費者，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供求律的槓桿原理，只有這個槓桿原理不受到任何干擾，才有自由市場可言，沒有自由市場，不可能有自由經濟。⁷ 可是自由放任開始以來的國家主義經濟，卻從來未有過阿當·史密斯的個人主義經濟，若真有個人的經濟自由空間，也只是有限度的局限在一個國族內的空間，離開了國界，他便被人為設立的局限失去了這個經濟的自由空間。直到目前為止，儘管全球化被高唱著，儘管歐洲正在努力促成歐盟共同經濟體，儘管南北美共同貿易區也正醞釀著，儘管亞太經濟理事會也在促成亞太共同經濟區，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未曾看到國家主義經濟有式微的跡象，90年代頻頻出現的全球各地的金融風暴，更令人看到經濟領域的達爾文主義並未有絲毫減弱的跡象。可是正是因為這樣，另一觀點也強調強大的經濟族群必

須照顧到弱小的經濟族群，這觀點正是七個經濟強國之所以對新興經濟體作出救市的理性根據。

綜合上述所言，既然以族群為社會結構的問題被西方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與經濟學家作出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也提出了不同觀點的理論。雖然他們在族群研究方面出現了阿里斯多德的文明與野蠻關係定位是那麼水火不相容，達爾文主義的淘汰論把強弱關係定位得那麼的勢不兩立，韋伯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機會看得那麼地偶然性。但是西方社會的族群研究也有其正面的看法，黑格爾提出的族群創造良性文明的巨大力量，羅倫茲提出的族群平衡發展的禮化觀點，阿當·斯密提出的個人主義經濟觀點，都可說是對人類發展提出樂觀的看法。作為東方人東方學者，我們對族群的生活體驗與歷史的實証經驗，應該也是不陌生的。因為中國也是由五十多個族群的小社會結構去組成一個大的國家。此外，每個東方國家也都如此，大家都有長期多元族群如何相處的歷史經驗，這些經驗卻未能有像西方人那樣用不同角度去作出研究而得到不同理論的論述，若能做到他們已做到的功夫，把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族群歷史經驗作出有系統，有科學，有思想，有哲學深度的研究，將之呈獻給人類智識寶庫內，互相觀摩，互相借鑑，使正確的族群關係得到比較與發揚，錯失的可受到揚棄。

客家學的研究與建立應如何定位？正是所有參與研究客家族群應加思考的問題。香港崇正總會在七十七年前建立的時候，其創會者便已對這問題深思熟慮過。而且很有智識地把創會宗旨強調為考證客家源流，研究客家族群歷史文化，汲取其精華，本著崇尚正義，愛護本族，愛護中華民族，愛護世人的精神，把客家精神宏揚廣大。用黑格爾的看法這正是為世界文明作出貢獻的態度，依黑格爾的貢獻標準，是否有貢獻，是否良性的貢獻，而非毀滅性的侵犯，則視乎一個族群存在著多少克服自然環境的文明智識足以為

世人提供生存的智識。崇正總會一向強調客家族群是漢族強大的一支，人口以現有來計，超過一億人，分佈中國十八省以及世界各地，以文化來計，秉承中原古文化之餘，仍具古風，經歷代戰亂，經歷多次大遷移，與其他族群雜處，仍然能夠做到文化上的承先啟後這個文化演進的經驗，實是難得。如果好好加以研究與作出系統的整理，客家學必然可為世界文明經驗充實不少。就以血統來論，崇正總會很早已看到，客家族群不但在戰亂中幾經大遷移，經受了與不同族群的相處，承受著不同環境的熬煎，無論是先天的遺傳觀點，或是後天的環境適應能力觀點，都可以是很好的族群演化的研究個案。

III. 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的開展

根據香港崇正總會從創會以來對客家族群所做過的研究工作，以及其協助推展過的研究工作來判斷。其對客家學的定位不但放在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一環來看，同時也放在科學研究的方法來看。

對任何學問，最終能成為一門學科必須具備三大條件：第一是可觀察的 (Observable)；第二是可分析的 (Analytical)；第三是可預測的 (Predictable)。正如物理學之所以能成為學，首先是物理現象明顯可以觀察得到，可以分析得到，可以預測得到，如氣壓現象便是如此，會受到不同氣壓的影響而有不同的呼吸現象，程度差別極大的，會導致呼吸困難而暴斃。這種氣壓的物理現象完全可以觀察得到，可以分析得到，也可以預測得到，物理現象經過這三大條件的考驗下，終成了一門物理學。客家族群研究要成為客家學也得經受這三大條件的考驗。香港崇正總會由創會以來所進行的客家族群研究確實也是朝這三大條件為其研究指標去進行工作的。這可以從其所做過的研究工作看出來：

第一是 編著出版《崇正同人系譜》

第二是 開展客家源流研究

第三是 客家學得到更全面發展

這三大工作是經歷七十多年來不斷努力，累積出來的承先啟後的成就。這三大工作之所以稱得上學的三大條件，可以作如下分析看出來：

(一)《崇正同人系譜》與客家學

在七十七年前香港崇正總會成立的時候，其創會者賴際熙教授便以其自己的文史專業，編著《崇正同人系譜》⁸，要了解這系譜對客家學發展的重要性，得要先了解這系譜有什麼科學研究的意義。

要了解系譜的科學研究價值，得從達爾文的進化論與羅命茲的禮化行為 (Ritualized Behaviour) 去了解。達爾文從所有生物的進化過程發現生物為了適應環境的條件，不得不在其生理結構上作出自我調整，從而得能適應環境而生存下去。但這種生理結構上的調整不是所有生物都能做到，做不到的便要被淘汰而絕種。做得到的便繼續生存下去，做不到的原因是因為生物本身內在的遺傳因子不夠強韌，否則會將其優質的遺傳因子傳給下一代，下一代繼續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強化其優良的遺傳因子，將之再傳給下一代，如此不斷遺傳下去，便是生物生存之道。為什麼同是一種生物，有的得能將優質遺傳因子傳給下一代，有的不能？後來的科學家証明了其中一個最大的失敗因素，是族群內部近親結合，促發了壞的顯性遺傳因子，傳給下一代，有的新生代因此顯著變得低能。

羅命茲在禮化行為研究中，發現動物皆有禮化的文化行為，這種行為使到不但族內成員有一個共同的禮化代號，使到他們能有共同的溝通工具，甚至對族群之間也有這種禮化代號，儘量使到彼此的溝通能建立一套禮化的溝通工具，以文明辦法相處，儘量減少

衝突以至傷亡，對羅倫茲說，人與人之間，動物與動物之間，甚至植物與植物之間，動物與植物之間，都存在著一種禮化的行為，傳統上人創造出種種崇奉自然界眾神的信仰，把眾神化身在山川大樹草木，便是這種禮化行為的表現，使到生物與環境的關係能互相制約又能共生的平衡發展，羅倫茲及其科學同僚研究的成果，後來成為生態學傳誦於世。

賴氏研究與編著《崇正同人系譜》的動機，正是具有達爾文優生學與羅倫茲之生態學的觀點。這可以從他的序文裡頭說明這點。首先他指出中國歷代撰寫系譜的功用：譜牒之作，非以標榜閥閱，矜誇博瞻也。將使人皆從流溯源，因此知彼在己無自貶之，「見於人無相輕之心，不自貶則可以邁遠，不相輕則可躋大同。故自古譜牒掌諸史官，其體最尊，其職極重」。⁹ 他這番話說明了中國人自古雖未有像達爾文那樣採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對優生學的研究，但這不等於中國人不懂得優生學的重要性。中國古代已從實証的研究方法 (Empirical Study) 得知優生學的作用。這可以從其溯源的工作看出來，依照賴氏的看法。溯源可以把人物的蕃盛紀錄下來，否則「非各考其系統則無以知其蕃盛之所由」。¹⁰ 這是對優生家世的紀錄，只有這紀錄，才能知道優生家世，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人的優生血統的撰擇有所根據。賴氏又說溯源可以紀錄血緣的關係，否則「非互述其淵源則曷以究其親睦之所底」。¹¹ 這樣的作用便可以避開達爾文說的以免近親結合的壞遺傳。此外賴氏還進一步指出溯源可以把有成的事業紀錄下來，不斷推陳出新的事業紀錄下來，使到美得彰，盛得傳，這對於後人的精神士氣有激勵效法的作用，這在遺傳學上可解釋為後天的熏陶作用。

對於姓氏的系譜研究，在遺傳學來說是很重要的，通過姓氏的系譜紀錄，並道出他們「結社聯姻通家會族」的情況，以同姓不結婚的家規，這樣便可

以大大減少近親血緣通婚的可能性。

接下來且看看賴氏編著系譜的生態學思想。在他的系譜中，他也花了大量功夫去研究客家語言源流，從中道出客家族群的禮化代號，指出客家族群自我認同的根據，更道出這些語言禮化行為所得到的族內自我認同，不但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令到族群內，無自貶之見。族群之間無相輕之心，不自貶才有可能自愛。求上進，不相輕則可以與他族共躋大同世界，賴氏這種見解，以生態學來看正是族與族之間，人與自然環境之間，自然界萬物之間，求得一個平衡發展的機會，只有自己愛生，才能愛他生。人類要愛惜自己的生存空間，不可能不讓所有生物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否則便只有所有生物一齊互相摧毀。從他以客家語言考証去找出其語系根源的做法，也可看到賴氏這做法。不外想說明客家語系根源與中國中原文化有相通之處，這個相通也證明了客家族群從語言習慣到文化吸收都沒有排他性。即他說的不自貶也不相輕。客家族群的過去傳統如此發展出來，這種傳統依然不變。到今天，客家族群不但能自尊而堅守自己的語言，無論在中國或移居到外國，也都一樣能尊重他族的語言文化，學習他族的語言文化，而且成為海外華族中最強於學習他族語言的一個族群。這種又能守住自己語言同時又能學到他族語言的現象，看似矛盾，但在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已是生態平衡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促進互相溝通，互相接受，共躋大同的應有做法。

(二) 客家源流研究與客家學

除了賴際熙編著《崇正同人系譜》之外，另一位崇正總會領導，著名企業家著名報人胡文虎先生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客家學的工作，在他領導崇正總會期間，他不但將客家同人的組織遍及東南亞，更對客家文化的研究與發展推前了一步。這種重視態度可以從他在亞洲各國興辦超過16份不同語文的報紙

來助長資訊交流可以看到他重禮文化的態度，他捐出巨資授命香港人學學人羅香林（崇正理事）等，根據客家族群的姓氏族譜進行研究客家源流。

為什麼說胡文虎為客家學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呢？正如上述指出的，客家研究要成為客家學，首先必須要能確定真有客家族群特性，有特性才能有客家現象，真有客家現象才可能觀察得到，也才能分析得到，預測得到。早在1920年代胡氏已留意到這個文化的問題，而且也根據這個嚴謹的學術方法進行對客家族群的研究。這便是他願捐出巨款授命羅教授從事學術研究的動機。

以胡文虎在多個國家最多族群雜處的東南亞生活體驗使他相信族群具有自己特性的重要性，否則便會流於賴教授所指的沒有自尊便不可能尊重他人，他之所以認同賴教授的觀點而大力支持崇正總會的建會宗旨，正是因為他自己也有此種信仰。

在《客家源流考》，羅教授引述美國耶魯大學韓廷敦教授 (Ellsworth Huntington) 的《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 指証韓說客家族群有其特性。¹² 羅教授把韓所說的特性抄錄下來排在《客家源流考》的緒論裡，現且抄述如下：

『客家人的歷史，很值得仔細的研究。許多有眼力的人，不說過麼，他們是今日中華民族裡的精華。他們的毅力，愛清潔的習慣，對於婦女的尊重，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難得的特點。他們和比他們早到南方的移民，就是現在圍著他們的土著，很不相同，好比這些比較進步的南方土著和現在還在北方的中國人的不同一樣……客家人要不是因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壓迫，大概也不會離開北方的老家的。在這層上我們確有相當書面的證據。』¹³

儘管引文內所提到的客家族群的特點還不夠全面，但對於『源流考』的工作來說，這已提供了一個重大的啟發，使人相信客家現象真有其事。因此有必要下定決心進行更全面而又深入地研究。

為什麼要從源流考下手去研究呢？這也是受韓教授的啟發而來，韓著也提到，『當他們遷移的時候，自然淘汰的勢力，一定很活動，逐漸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後面，所以凡是能夠到達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較有毅力有才幹的。』¹⁴ 由此可見，受韓教授的啟發，從源流考下手研究，最少可以有兩大學術優點。第一是證明客家族群源自中原，具有久遠的歷史文化根源，而且是中華文化最早的文明一族，幾經演化的結果，其文化前途如何？沒有人真正做出研究，最常聽到人說的，中華文化五千多年，也慣常聽到人說這個中原文化便是漢人的文化？但是到底那一個族群才算是真正的漢人？又好似人人都自稱漢人，漢人也就不大了了。只有客家族群，既能證明其為最早的中原一族，也是最早的文明一族，他是不是漢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算是中原文化的始祖。第二，客家人既然是中原文化最早的一族，研究他的文化在久遠的歷史演變中如何面對，而他又是最能維持其族群的純性。難得的是他真是唯一最大的族群在歷次的動亂中，不斷遷移，離開原居地，遍佈中國十八省，與其他族群實地相處。對於想了解族群之間如何接觸，接觸之後如何面對彼此的文化習慣，如何互相調整，如何互相吸納，如何作出整合，或是同化，或是拒絕，在什麼情況下作出吸納或拒絕，在什麼文化項目方面可作出吸納或拒絕。以客家族群的經歷可以說是研究中華文化的演化經驗，較具代表性的一個個案，也是很好的個案。由此可見胡領導的研究工作選擇從源流考下手去研究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此外，源流考也提供了另一個更大的好處，可以從生態學的角度來下手研究，也為客家學研究建立一個科學的基礎。在研究的過程中，《源流考》發現在客家族群的歷次大遷移中，他們不但要同不同的族群重新建立人際關係，更要與不同的環境作出新的適應性，如果用黑格爾文明良性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這個表現，客家族群能夠在新環境，新人事的變遷中，依然能夠維持其客家特性的同時對他族作出適當的調整，對新環境作出新的克服。客家族群，也由中原的文化區走到南方文化區，可以說是相當大的文化落差，尤其是語言教育都有極大的差別，但他們依然能夠將他們的教育設在族內祠堂內，使到他們教育子孫的工作不被荒廢掉，對克服新環境的精神，《源流考》也指出客家族群在離開中原平原地區後，遷入台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貴州等地。所構成的三角形地區，都是山地與丘陵地帶，而且都是在此地區著名河川的上游，由於河川在山地源頭落差大，『每到大雨，山洪暴發，石墮沙飛，淤阻河道，遂成水災，沒田園，沖房宅。』¹⁵ 這樣的環境，要加克服，非要一定的文化韌性不可。但客家族群卻不像黑格爾所指的游牧民族與沙漠族群那樣強於侵犯他族，他們寧願選擇在這些極少人煙的荒野野嶺地帶開發他們的家園，寧願選擇與惡劣的環境戰鬥，也不去侵犯山川下游的富庶平原地區。這種選擇不與人鬥而與天爭的韌性文化態度，使到客家族群不但因此不自卑而有自尊，更因此而不輕人，尊重人。黑格爾所指的文明特性，客家族群也就當之無愧。在黑格爾心目中這樣的文明一族才是領導世界走上更文明的力量，對於黑格爾來說，這種文明一族所具備的特性是可以觀察得到，可以分析的，也可以預測得到的。因為長遠來說他們所走的人類發展道路：第一，是選擇不侵犯他族，因此所面對的變數不大，若然，無論是他們的主體與客體關係，都較穩定發展，因而觀察他們的分析與預測的程度更能在掌握中。第二是選擇克服環境的困難，是增長自己智識的最佳途徑，更能掌握智

識的族群，也就是相對地更能被分析的，可被預測得到的行為。因為他們的行為會因為他們的智識的結果而顯得有邏輯性，衡量度高，理性化強。

由上所述各點，可見《客家源流考》選擇族源去進行研究客家學是很有見地的，客家學的科學性也因此找到了他的方向。雖然更精密的資料還得靠大家今後努力地搜集更多的田園資料可以跟隨著源流考所指的三角形地帶去做田園研究。

(三) 客家學之進一步開展

跟著賴際熙與胡文虎兩位首長之後，崇正總會戰後在張發奎理事會與黃石華理事長的領導下，更全面地開展著客家文化推動客家學的研究與建立，也因此得到更全面的發展，說其更全面是因為現在的研究工作，在香港崇正總會的努力推動下，已不只限在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能夠發動中外數以千計的著名學者參與客家學的研究，而且涉及的研究方法也多元化，跨科際研究的地域範圍也不只限於中國本土，還包括全世界各地。更難得的是為了進一步想研究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跨族關係，近十年黃石華理事長甚至領導崇正總會同人開展了族群的研究。因此，至目前為止，其研究收穫不但就客家學本身來說是空前未有的，比較全世界其他族群之被研究成果，相信也不下於英格蘭，日耳曼，猶太族之被研究成果。現在且詳細將其開展的研究工作論述如下：

首先且討論黃石華教授對於客家學的看法。在他為賴際熙編著《崇正同人系譜》重印所作序文中指出：

『本人認為，客家學對客家民系研究，應該運用科學方法和觀點，系統地研究客家族群的歷史源流，組織，現狀和發展規律，推及社會，經濟，語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識的發生，演變，指出該族

群發展的規律，並以科學方法預測其未來趨勢』。¹⁶

從此段話中，可以清楚看到，黃理事長對於客家學的要求全符合上述的三個科學要件，他所指的要找出客家族群發展的規律，所謂規律也就是一個個體特有的現象，因為其特有，所以不易被其他個體的行動軌跡所干擾而無法探知其動向。否則不可能有其自己發展的規律，沒有自己的規律，也就無從作出對其預測的工作。

與《系譜》與《源流考》的想法相似，但黃理事長的族群研究不但在方法上更全面，甚至更強調研究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問題，對他來說，更重要的，不是孤立地研究客家族群本身的特點，客家族群的文化若有特質，不單是他本身生存的優質能力，而是他與其他族群相處的特質。這點，《源流考》也提到，但是卻沒有像黃理事長那樣地全面，這可以從他下面的話體會出來：

『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民俗學等科學的角度，作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探討客家族群與整個民族及中華大傳統的關係，分析客家人族群性，於人類文化的意義，進而以科學論證，客家族群對中華民族，與世界人類所作的貢獻。』¹⁷

黃理事長的這種觀點，已符合羅倫茲的族群文化網絡不斷伸延，不斷吸納，不斷壯大的生態學觀點。黃理事長從整體中華民族的大社會來看各個族群小社會的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能構成一個大社會，不單是客家族群的貢獻，同時也是大家集體的貢獻，只有從整體去研究，同時又從個體去研究才能見到個體的優點，整體的包容性，這便是他把客家學與(中華)民族學分開來的原因，因為只有分開對待來研究，才能顯示出中華民族的整體文化的多元化，也才能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大同化。崇正總會的客家學發

展，從賴教授開始到黃理事長的時代，從來都未曾不強調客家學的個體性與全人類的大同性。黃教授的大同思想從族群的研究角度切入，以文化的個體貢獻與整體發揮的想法，比起其他思想家哲學家與宗教家企圖以思想、哲學與宗教去單一化世界的想法，確是會有較大的可行性，因為他的想法是大同的文化思想，而非單一化的文化思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個體族群的特性。而這特性也正是這個族群從生態學中所指的智識累積的成果。因為如黑格爾所說的，每個族群都有他們特有的文明，因為這個文明是其克服環境所得來的智識的成果。世界地理環境既很不劃一，產生多元文明是自然現象，存在著多元文明，也是智識多元化的豐富保證。

黃理事長不但有這種科學的文化觀點。同時也很有實踐其理想的科學辦法，為了實現他想把客家學作出整體的，有計劃的資料蒐集與發動國際學術界的參與研究工作。他做出下列重大的推動研究工作：

第一 組織國際研討會專攻客家學研究

1992年，黃理事長首先接觸人類學者謝劍教授，請他聯同政治學者鄭赤琰教授一道發起組織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並由黃氏親領謝、鄭兩人去會見胡文虎基金會主席胡仙博士，請胡博士捐出研討會經費五十萬元港幣。於是第一屆研討會成功在1992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由香港中文大學之中國文化研究所與海外華人研究社，人類學系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華南及印度半島人類學研究所主辦，宣讀論文達70篇，參與討論學者來自歐、美、日本、東南亞、中國、港、台等地超越三百名。以族群國際研討會來論，可謂罕見有此規模。參與學者也多是國際知名專家，其中更不乏學術界權威，如王賡武，David Faure，Jacques Lemoine，金耀基等。大會從客家族群淵源，宗教信仰，民族藝術，語言文字，社會組織，歷史人物，以及客家學在各地研究發展的討論，¹⁸

真可謂全面展開了客家學的研究。這正是黃理事長所預期的。接著1992年之後，1994年、1996年分別在香港與新加坡舉行了第二屆、第三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第四屆便是1998年在台北舉行的國際研討會。由香港跨陣容可說愈擴大，由黃理事長領導的香港崇正總會真可說做了大量的推動工作。

第二 推動組織國際客家學會

有見於客家學研究是個長遠的工作，否則無法作出有系統而又全面地做資料搜集和研究出版等工作。黃理事長還極力從旁助成國際客家學會的成立，並從旁協助籌募其經費。學會成立以來主催與聯系其他國際學術團體參與組織上述國際研討會。

第三 發動國內外學術機構參與發展客家學研究

黃理事長為了更廣泛發動國內外學術機構參與發展客家學，分別接見、探訪、資助了國內外學者如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倫敦大學，劍橋，牛津，巴黎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京大學等知名學者，鼓勵他們參與其事，並成功資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設立客家學系，設立研究院。

第四 資助出版研究成果及文獻資料

為了研究成果得能廣泛傳播。黃理事長並極力推動崇正總會資助出版專著，除了資助出版第一、二屆論文集外，勞格文教授主持研究客家文化的十本系列叢書《客家傳統社會叢書》也由崇正總會協助出版。《崇正同人系譜》（賴際熙編著）和《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等具有文獻性質的材料也受到重視而再刊印。此外，還有不少個別研究專著也得到資助出版。

第五 贊助嶺南大學成立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正如黃理事長期望的，要真正使到客家學能夠奠定其研究基礎並成為廣泛研究的興趣，單是開展客家學不夠還得發動學術界開展其他族群的研究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完成黃理事長所說的只有通過各種族群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於是黃理事長主動向嶺南提議成立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並得該學院立案照辦，研究機構已在今年8月1日開始工作。首屆國際閩南學研討會，潮州商業網絡研討會，馬來西亞經濟發展與族群關係研討會也將在明年分別在港舉辦。

由上所述可見客家學在香港崇正總會歷屆領導努力推動下，已成為國際族群研究最具規模之舉。在其影響下，潮州學研究舉辦了二屆國際研討會，其他族群的研究也都正在起步。因此可見崇正總會的學術推動工作功不可沒。據金耀基教授的觀察，崇正總會以族群社團性質創會，能成功將其活動人力財力協助推動對其本身與他族群文化的學術研究，若非史無前例，也是規模空前未有。

IV. 結論

通過上述的討論，可見香港崇正總會由七十七年前創會開始，已有計劃地要展開對客家學的研究與建立，幾經歷屆領導不斷的努力，最近更在黃石華理事長推動下，成功地把客家學發展為國際的研究工作，並因此把客家學定位為科學的，哲學的，有思想性的學問，也因此啟動了學術界對其他族群的研究興趣。

V. 註釋

1. 根據一項調查，美國有7500萬公民認為自己是少數族群的成員。

2. Aristotle, *The Politics*. Baltimore: Penguin Book, 1962, pp.6-7.
3. 參考 G.W.F.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55.
4. 參閱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5. 參閱 K. Lorenz, *On Aggression*.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6.
6. 參閱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7. 參閱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chapter 1-3.
8. 參閱賴際熙編著，《崇正同人系譜》，香港崇正總會編印，1995。
9. 同上，卷首，序頁2。
10. 同上，頁1。
11. 同上。
12. 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Character of Rac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5.
13. 參閱編輯委員會《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錄》內篇羅香林著：客家源流考，頁25。
14. 同上。
15. 同上，頁76。
16. 參考註8，卷首黃石華：崇正同人系譜重印序言。
17. 同上。
18. 參閱謝劍，鄭赤琰主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1994。

有關本研究部之出版：

族群研究論叢主要探討有關中國各族群的歷史研究和發展方向。

有興趣的人士可向以下地點查詢：香港屯門，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電話：(852) 2616 - 7696

傳真：(852) 2465 - 0977

作者簡介：

鄭赤琰教授為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主任。鄭教授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並為該系系主任。於中大期間並創辦了「海外華人研究社」。鄭教授研究興趣主要包括海外華人問題、中國外交政策、亞洲國際關係和東南亞政府等。有關海外華人的專注包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海外華人》(1989, 與吳倫霓霞合編), 《香港與亞太區華人銀行業》(1991, 與饒美蛟合編), 《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4, 與鄭良樹合編), 《客家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4, 與謝劍合編), 《中國關係學》(1996, 與文灼非合編), 《香港回歸與兩岸關係之展望》(1999, 與王家英合編)。